

马光仁，1937年8月生
山东兖州人，中国共产党党员
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党支部书记
新闻史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研究员，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
曾任中国新闻史学会理事、上海新闻学会理事
从事中国新闻史教学与研究20余年，发表科研成果共约400万字
著作有《上海新闻史》
《瞿秋白年谱长编》（合）

马光仁◎著

Ma Guangren anthology

马光仁文集

《简明中国新闻史》等。《上海新闻史》

1997年荣获上海社会科学院

1995~1996年度科研成果特等奖

1998年度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

（1996~1997年）著作一等奖

参加撰稿著作有《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新闻学大辞典》

《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

《新编上海大观》、《上海新闻志》、《中国新闻实用大辞典》

《上海文化通史》、《上海年鉴》

《上海哲学社会科学科技发展报告（1978~1993年）》

《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化事业》

《中国近现代大典》等

其中《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一卷

1995年荣获北京市哲

1994年荣获上海市哲学社

主编和参加编写文集有《中国新闻史文集》

《继往开来》、《抗战时期上海新闻史论集》等

发表论文80余篇，其中10多篇分别被收入

《中国军事文库》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贡献》

《瞿秋白研究文集》、《瞿秋白研究》

《中国当代论文选粹》、《辉煌二十载》

《中国当代决策文革》等文集中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1994年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三等奖

目前主持“上海当代新闻史”项目

参加《中国地区比较新闻史》撰稿工作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马光仁◎著

Ma Guangren anthology

马光仁文集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光仁文集/马光仁著.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2

ISBN 978-7-5520-0202-7

I. ①马… II. ①马… III. ①新闻事业史—上海市—文集 IV. ①G219.27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1943 号

马光仁文集

著 者: 马光仁

责任编辑: 刘 佳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34.5

插 页: 2

字 数: 5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0202-7/G·235

定价: 8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天道酬勤

(代序)

熊月之

天赋、勤奋、机遇这成才三要素中,天赋是命,难以改变,机遇是运,难以把握,只有勤奋掌握在自己手中。谚云:机遇总向有准备的人招手。所谓“有准备”,总是与勤奋好学联系在一起的。成才与否,勤奋是关键。马光仁先生就是我熟悉的依靠勤奋、抓住机遇取得非凡业绩的学者。

勤奋,意味着勤于动脑,善于寻找适合于自己发展的学术领域。新闻史是新闻、历史两大学科的接合部。新闻以报纸刊物为主要研究素材,而报纸刊物都是到近代才出现的,因此,新闻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历史不长,学科积累也不厚。马光仁先生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特点。他从事新闻史研究,是在特殊年代里起步的。1970年,复旦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马先生参加了中共党史教学工作,开始接触新闻史专业。他从翻阅与中共历史有关的《新青年》、《向导》、《热血日报》等报刊入手,逐步进入新闻史领域。那时候,并没有人要求他从事新闻史研究,但他觉得,要讲好党史,讲好党在新闻方面的特点,不深入研究这些报刊是不行的。于是,他一头扎了进去,一发而不可收。

勤奋,意味着多花时间,多投精力。马先生在复旦大学,教学工作很忙,还担任一些行政职务,用于科研的时间很少。没有大块的科研时间,他就挤零碎时间,积少成多。大概有十多年间,几乎所有的寒暑假与其他节假日,他都放弃休息,泡在上海图书馆里,查资料,做卡片。学校组织的教职工旅游、疗养,他也一概不参加。

勤奋,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意味着勤于阅读,勤于写作。马先生参加过许多集体课题,涉猎很多新闻史专题。他研究过中共早期报刊历史,研究过1949年前后报刊历史,研究过上海地区报刊历史,参加过《上海新闻

志》、《上海文化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志》等多项集体项目。每做一个课题,他都一丝不苟,尽心尽力。他的阅读量相当大,写作极其勤奋,成果自然相当丰富。民国时期的《申报》,他一天不漏地翻过。1949年以前出版的中共重要报刊,他也一一读过。在他的名下,有《上海近代新闻史》、《上海当代新闻史》、《中国近代新闻法制史》等一长串著作,还有一大批论文。

勤奋,对于学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是勤于思索,勇于学术创新。马先生从1979年开始发表论文,以后佳作不断,对《新青年》的编辑方针、瞿秋白的理论贡献、史量才的办报业绩、汪伪的新闻宣传、孤岛时期的上海报刊、上海解放时期对原有新闻单位的接管、新闻法制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独到见解。马先生虽然是人到中年才步入新闻史领域的,但他目光敏锐,善于捕捉学科前沿问题,也很注意运用新的研究方法。他曾花相当多的时间对新闻业当事人进行采访,包括新闻出版局、文化局、解放日报社、广播电视局的一些从事新闻业多年的资深人士,获取了大量的、在书刊与档案里都看不到的第一手资料,这相当可贵!这也使他的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口述采访,在今天史学界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使用,但在二十年以前,还很少有人有效地使用。马先生在这方面,可算是立在潮流前面的先驱。

勤奋,意味着要有恒心、韧劲。马光仁先生在这方面很令我感动。他原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领导,与我所在的历史所曾同处一楼,我亲见他如何勤奋用功,看着他如何将一袋一袋《申报》拎回去,再一袋一袋拎回来。退休后,他还是那么勤奋,过一阶段就发一篇文章,隔一两年就出一本书。他家境宽裕,不用他去赚稿费,也用不着参加科研考核。那么,他勤奋的动力何在呢?曰爱好。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即对学术不附加任何其他功利目的的纯粹兴趣,这是治学最为可考的动力,也是治学的最高境界。

曾国藩说,勤之道有五,一曰身勤,二曰眼勤,三曰手勤,四曰口勤,五曰心勤。马光仁先生五勤兼具,所以,他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成为我国著名的新闻史专家。

天道酬勤!马光仁先生为我们树立了一位勤奋治学的光辉榜样。这部《马光仁文集》,就是他勤奋治学的部分结晶。我作为他的学术后辈,很乐意在他的自选集出版之际,撰文鼓吹!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天道酬勤(代序)	熊月之 001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001
瞿秋白与毛泽东思想萌芽	011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	022
论毛泽东的新闻思想	040
新闻事业的一场大变革	
——上海解放初接管旧新闻单位的前前后后	050
我国新闻法的演变及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	059
战后国民党对申、新两报的控制	067
任白涛与新闻学研究	074
袁记《出版法》的制定与废止	079
有关党的早期报刊的一些史实	
——访郑超麟	084
上海人民反对印刷附律的斗争	091
旧中国新闻立法概述	101
刘煜生事件与记者节	111
日伪反动新闻政策在上海的实施	120
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的《红旗日报》	135
旧上海广播电台改造始末	155
旧上海的晚报	163
储安平与《观察》周刊	176
1921 年檀香山世界报界大会简述	182

抗战时期的《申报》	186
民初《申报》初探	202
上海新闻界的抗日宣传	215
西方文明与上海近现代新闻事业	225
上海近代新闻事业的历史地位	235
20 世纪上海的新闻史研究	260
新中国成立前上海对党报建设的贡献	268
中美新闻界友好交往的先驱	
——简介美国著名新闻学家威廉博士五次访华	285
上海近代新闻教育的发展	295
坚持自己理论观点的“右派”王中	316
史量才为办报献身	324
旧上海新闻社团的嬗变	341
舒宗侨与《联合画报》	366
近代上海新闻界的对外交流	372
《申报》与新闻学研究	398
丰硕的成果	
——改革开放三十年上海新闻史研究成果巡礼	411
上海通讯社小史	420
从《申报》看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规律	449
近代外国人在上海新闻事业概述	462
近代上海报纸副刊的演进	494
《东方杂志》与新闻学研究	538
后记	541

试论“五四”时期陈独秀对 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贡献*

五四时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过渡时期。在中国社会大转变的过程中,陈独秀以反封建的勇猛闯将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扩大,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他也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成了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和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

一、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开辟道路

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某些方面在中国出现,并非始于五四时期,早在辛亥革命前,在中国的报刊上就已陆续有人零星地介绍过了,但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并发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其原因除了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基础——工人阶级不够壮大外,中国尚不具备广泛传播的思想条件:一方面,思想阵地仍被封建主义牢固地占领着;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前,先进的中国人认为只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才可以救中国,他们希图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后连续出现的两次复辟,打破了一些人试图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甜梦,不得不另外寻找解救中国的出路。五四前,中国掀起的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补上了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批判封建主义这一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开辟了道路。陈独秀在这场思想革命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曾被毛泽东同志赞誉为“提倡近代思想最

* 原载《复旦学报(未定稿)》,1984年5月。

力的人”，是“思想界之明星”。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由《新青年》发起，并以它为主要阵地而开展起来的。为《新青年》的宣传活动作出贡献的有一大批杰出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反封建思想的深度而论，陈独秀比不上鲁迅；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水平，陈独秀更落后于李大钊。但纵观全局，陈独秀对《新青年》的影响是全面的，具有决定性的，这是其他任何人不可比拟的。他是《新青年》的创办人，长期担任主编，宣传中的一切重大方针和决策大都是由他决定的。他团结了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的樊笼，清除了新思想传播中的障碍。这场启蒙运动唤醒了广大青年追求新思想的热情，推动他们努力探求解决中国问题的新出路。这就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和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五四运动的爆发反过来又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由此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新的一页历史。因此，把《新青年》的历史功绩和陈独秀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

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不仅使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在《新青年》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刊物逐渐变为马克思主义阵地的过程中，陈独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公理战胜强权的议论盛传于中国思想界。同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重要演说，赞扬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功。《新青年》五卷五号上发表的这篇演说词和李大钊的另一篇论文《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成了最早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献，也象征着《新青年》向新的光辉时期过渡的开始。五四运动后群众要求了解马克思主义的愿望普遍提高，为适应这一客观形势，1919年6月，《新青年》六卷五号编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这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刊物。

正是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陈独秀开始由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向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20日，他在《每周评论》18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一文中说：“十八世纪法兰

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纪俄罗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人都对着他们极口痛骂,但是后来的历史家,都要把他们当作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他主编的《每周评论》在五四以后,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逐渐增加,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阵地。同年9月,陈独秀出狱。10月他主持召开《新青年》编辑部会议,制定了新的宣传方针,并体现在他起草的《本志宣言》中。《宣言》表示:“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造成了无穷罪恶,现在应该抛弃了”^①。这里的军国主义是指帝国主义,金力主义是指资本主义。尽管观念还比较模糊,表达也不甚确切,但《宣言》大体上确定了《新青年》的社会主义方向,这是可以肯定的。

《新青年》迁回上海后,仍由陈独秀一人主编。1920年初,在思想上经历较短时间的波动后,他很快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并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有计划、有组织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这年5月,他把《新青年》七卷六号编辑成“劳动节纪念”专号,篇幅比平时扩大了一倍,详细介绍“五一”斗争的历史和各国工人运动的情况,大量报道了全国各地工人运动的情况,对俄国革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各方面情况也作了介绍。不久,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全国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新青年》成为发起组的机关刊物。为了推动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从1920年7月出版的八卷一号起,开辟“俄罗斯研究”专栏。由于当时中俄交通不通,陈独秀就千方百计译载当时能搜集到的英、美、法、日等国报刊上有关苏俄革命理论和实际情况的材料。它先后发表了列宁的《关于党纲的报告》一部分(当时标题为《民族自决》)、《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经济和政治》(当时标题是《过渡时代的经济》)等著作,介绍了列宁的生平以及苏俄政府各方面的情况。由于这些材料正是热烈追求马克思列宁主义,希望走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人们所急需需要的,其影响和作用也特别大。《新青年》的宣传,唤醒了广大知识青年,使他们投身于革命的洪流中;它哺育了党的整整一代革命家。

上海党的发起组成立后,全国各地陆续成立了党的发起组或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有了新的发展。为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上海小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除了加强《新青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外,还组织了《新青年》社,出版了大量的经典著作和介绍十月革命的

^① 《新青年》,七卷一号。

书,如《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阶级斗争》、《十月革命》等。1920年11月,又创办了半秘密性的理论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介绍了第三国际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特别是列宁的建党学说和俄国共产党的经验,为建立全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作了思想理论准备。同时为了向工人通俗地宣传马克思主义,陈独秀还创办了《劳动界》周刊等工人刊物。这样,上海就成了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中心。

三、积极开展思想战线的斗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蓬勃开展,冲破了中国封建文化专制的束缚,西方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像闸门洞开,涌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各种各样的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也在传播着。所有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都是在所谓“新文化”、“新思潮”的招牌下出现的,因而对当时的思想界特别是对青年学生有着很大的迷惑力和欺骗作用。这些反动思想就是反对中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反对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不与之作坚决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前进,无产阶级政党就建立不起来。在这场斗争中,陈独秀作出了重大贡献。

“问题与主义”的论战,是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在反对胡适贩卖的实用主义的斗争中,李大钊进行了正面反击。陈独秀作为援军积极投入了战斗。他在《主义与努力》一文中指出,“我们行船时,一须定方向,二须努力,不努力自然达不到方向所在,不定方向将要走到何处呢?”^①他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观点。但由于《每周评论》被封,陈独秀被捕,《新青年》暂时停刊,这场斗争没能深入地进行下去。

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陈独秀是和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并肩进行战斗的。这场论战的实质是中国究竟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论战的主要对手是张东荪、梁启超等人。他们是把自己伪装成社会主义者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标榜自己主张的是“基尔特社会主义”;他们反对用革命斗争的方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用“开发实

^① 《新青年》,八卷四号。

业”、“增加富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國发展资本主义。陈独秀以《新青年》为主要阵地,集中批判了张东荪、梁启超的反动观点。他发表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复东荪先生的信》等文章,用阶级观点批判他们的假社会主义谬论,明确地肯定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他指出,“自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以来,劳资两阶级日益分明,而且资产阶级的势力日见雄厚,劳动阶级日见压迫,除忍受安全以外几乎无路可走了”^①,因此,发生无产阶级革命是必然的。他还指出,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唯一出路,因为资本主义发展必然使生产力与私有制发生严重冲突,“没法救济,非弄到破裂不止”,“代它而起的自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方法”^②。

如果说,在前两次论战中陈独秀是以一个战士的姿态投入战斗的,那么,在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第三次大论战中他则成为了主将。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传入中国。五四运动前后,克鲁泡特金派的“互助主义”在国内影响颇大。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强权,主张绝对自由,大肆鼓吹“我们不承认资本家的强权,我们不承认政治家的强权,我们一样的不承认劳动者的强权”^③,直接攻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同时,他们在工人中加紧活动,争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更为严重的是,他们混入了党的发起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从内部进行破坏活动。1920年初,在上海刚刚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破坏,曾一度被迫停止活动。广东党的发起组成立之初,也被他们控制着进行反马克思主义的活动。不划清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不清除他们在群众中的影响,中国革命运动便不能发展,中国共产党也无法建立起来。

陈独秀举起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战斗旗帜。1920年9月,他在《新青年》八卷一号发表的《谈政治》一文,对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全面批判。在与无政府主义论战中,陈独秀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代表者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攻击的矛头也是指向他的。在《谈政治》一文发表不久,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又立即写信进行反扑(该信发表在《新青年》八

①②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九卷三号。

③ 《我们反对布尔什维克》,《奋斗》第二号。

卷二号上)。这样,斗争日益深入和尖锐化了。为彻底击败无政府主义者的猖狂反扑,陈独秀在《新青年》上组织了大规模的批判。“三战区声白”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他先后发表了《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学说》、《无产阶级专政》、《下吕的无政府主义》、《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等一系列文章和通讯。陈独秀主持创刊的《共产党》月刊,以主要篇幅展开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该刊创刊号上,他发表的类似发刊词的《短言》中,把批判无政府主义列为刊物的主要内容之一。

陈独秀在批判无政府主义时,集中批判了他们的“理论”核心,即绝对自由和反对一切强权的谬论。他指出,绝对自由是绝对不存在的,因为人类社会是以不同的方式联合而成的,“要绝对自由就不能联合,要联合就不能绝对自由”^①。还指出,对“自由”要作分析,要看对哪一个阶级有利,是哪个阶级的自由,否则抽象地谈论自由,只能对资产阶级有利。他说:“劳动阶级底枷锁和镣铐,分明是自由主义将他带上的;现在理想的将来的社会,若仍旧妄想否认政治的彻底改造,迷信自由主义万能,岂不是睁着眼睛走错路吗?”^②

对于所谓“强权”,陈独秀也明确指出,不能把“强权”与“罪恶”画等号。要看“强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为哪个阶级服务。如果说“强权”可恶,那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和无道者,压迫弱者和正义”,假如反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与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③。他强调指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是彻头彻尾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效劳的。如果照无政府主义者那样“不主张用阶级战争,天天空喊不要国家,不要法律……而仍然让资产阶级牢固地掌握着国家政权与法律”,“即便再过一万年,那被压迫的劳动阶级也没有翻身的机会”^④。同时,他在组织上也着手整顿被无政府主义者破坏的党的发起组。1920年底,陈独秀到广州后彻底揭露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罪行,把他们从党的发起组内驱逐出去,使广州小组回到马克思主义道路上来。

①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九卷三号。

②③④ 《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

四、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

五四运动的特殊意义,是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力量,先进的知识分子从俄国十月革命得到启发,又从五四运动的经验中认识到无产阶级的历史地位。他们开始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使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19年底,在决定把《新青年》迁到上海之前,陈独秀就布置各地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人中去调查研究。1920年5月,由他编辑出版的“劳动节纪念”专号,发表了大量各地工人情况的调查材料。尽管这些材料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作完全正确的分析,但它迈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第一步,这是极其可贵的。

陈独秀回到上海以后,也注意经常接触工人群众,1920年2月,他参加发起组织上海工读互助团;4月,参加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发表了重要演说;同月底,参加中华工业协会、中华工会总会、电器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工人团体发起的筹备纪念“五一节”的联席会,被推选为“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的顾问;5月,他支持袜厂女工组织职工会;9月,他和上海机器工会发起人共同起草工会章程;10月,参加了该工会的成立大会,被吸收为名誉会员。以后,他还参加了组织上海电器工会,纺织工会,印刷工会,邮电工会等活动。

在进行这些活动时,陈独秀十分注意对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但如何通俗地向工人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之成为广大工人易于接受的东西,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也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真正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关键。正如刘少奇1951年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指出的那样,当时如果没有马列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宣传,中国共产党是不可能产生的,如何使马列主义原理在中国人民中间通俗化起来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因为一个高深的原理,拿到中国人民中间,特别是拿到劳动人民中间进行宣传,来实践,来运用,如果不进行通俗化的工作,就不能在中国推广,劳动人民就不能接受。在这方面,陈独秀曾做了一些尝试:

第一,创办了向工人进行通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劳动界》周刊。它密切结合工人的生活 and 斗争,用朴素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向工人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创刊号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写

的《两个工人的疑问》。文章从大量日常生活中提出的社会上为什么存在着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启发工人思考问题,寻找原因,提高觉悟。之后,又连续发表了《此时中国劳工运动底意思》、《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穷人与富人热天生活之比较》等十几篇文章,用通俗的语言、生动形象的比喻,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原理,帮助他们认识到只有团结起来,以俄国工人阶级为榜样,干社会主义才有出路。

第二,参加工人集会,发表演说。陈独秀在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劳动者底觉悟》演说中指出,工人运动的目的,不仅要增加工资,减少工时,而且要求掌握管理权,“做工的劳动者要管理政治、军事、产业,居于治人的地位”。这篇演说发表在《新青年》七卷六号上,是当时引导工人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重要文章。

第三,帮助工人创办更加适合一般工人阅读的刊物。1920年9月,陈独秀帮助上海工商友谊会创办了《上海伙友》,他被聘为该刊的编辑,为刊物撰写了发刊词。为了解决出版后的具体困难,决定由《新青年》社帮助编辑,工商友谊会负责发行。不久,他又帮助上海机器工会出版了《机器工人》周刊,很受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被工人称为“我们劳动界的一线曙光”。

第四,组织工人夜校。1920年夏,上海党的发起组在陈独秀的领导下,在上海小沙渡创办了工人夜校,名为学习文化,实际上是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陈望道在《党的建立时期的情况》一文中回忆说:“用教语文的形式,借题发挥去教马列主义”^①。同年12月,陈独秀到广州后,创办了“宣传员养成所”,培养向工人群众通俗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宣传员。陈独秀的上述活动,有助于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相结合,提高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促进了工人团体的建立,从而发展了最早的工人党员。

五、陈独秀在马克思主义宣传中的局限性

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无论在政治思想和世界观上都存在着不少缺点。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接受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有时还明显地用资产阶级观点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在宣传马

^① 《党史资料》,1980年第1辑。

克思主义的过程中也往往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如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法律都是掠夺的工具”,应当以“劳动专政来代替”,但又说“这种工具有改造进化的可能性,不必根本废弃他”^①。这显然是一种糊涂观念,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理解很不深刻。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如何摆正个人同群众的关系,这是陈独秀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当时,他作为全国著名的学者、大学教授能够放下架子,经常到工人群众中去参加活动,应当说是很不容易的了;但是,他轻视群众的观点始终不能彻底克服。他想到的不是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再去教育群众,而只想到怎样教化群众,怎样改造群众的落后意识,始终以先生自居。因此,在宣传中常常将人民群众视为受苦的一群人,他说:“可怜我们中国幼稚的产业和幼稚的教育逼着我不得不鼓起勇气说句实话‘卑之无甚高论’”。甚至还说:“中国人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②这种错误观点也是他不能转变成为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能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是陈独秀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又一个突出缺点。陈独秀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时,在理论上基本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这对于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他没有能随着中国革命斗争的广泛开展而深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对中国社会的特点、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等从未作认真的研究和分析。比如,对中国革命的进程,他有时认为,“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的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③。就是说中国必先建立资本主义社会,而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在批判张东荪的假社会主义时又说:“此时我们中国不但有讲社会主义底可能,而且有急于讲社会主义的必要”^④。这就取消了中国革命的阶段性。

陈独秀的上述缺点是严重的,是不应当回避的。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他在五四时期宣传马克思主义所起的历史作用。列宁曾说,

① 《谈政治》,《新青年》八卷一号。

② 《卑之无甚高论》,《新青年》九卷三号。

③ 《国庆纪念底价值》,《新青年》八卷三号。

④ 《社会主义批评》,《新青年》九卷三号。

“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内”,要“估计到”一定“历史时代”的“具体特点”^①。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陈独秀身上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有些是不可避免的。

(与姚守中合)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12页。